



#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 年代及墓主问题

倪润安

**内容提要** 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是北京地区发现的一座出有特殊壁画石龕的重要墓葬。石龕出现的原因必与墓葬的时代背景及墓主人身份密切相关。本文从“晋制”演变发展的角度考察该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年代范围，首先进一步研究充实魏晋都城洛阳地区“晋制”墓葬的演变序列和阶段性特点，然后以之为参照，建立北京地区魏晋墓葬的演变系统，从而认为该墓的年代为西晋晚期，下限可到十六国初期。石龕壁画的中心图像是执麈尾正坐的男墓主人，这一形象是改进东汉旧样后、创新于幽州地区的新图式，体现了与幽州鲜卑的文化联系。本文由此进一步推测，八角村墓墓主人为遇害于薊城的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该墓为二次改葬墓，石龕为段部鲜卑单于供奉的祭龕。

**关键词** 八角村墓 西晋晚期 壁画石龕 刘琨

1997年3月，北京市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在八角村西北部清理了一座砖室墓，该墓为前、后双室结构。墓门为两扇画像石门，上部刻执戟武士，下部刻三角纹。前室北侧壁建一石龕，庑殿顶，龕内三侧壁面绘彩色壁画。石龕前斜躺一具男性骨架，基本完整，身高170厘米左右。墓葬经盗掘，残存的少量随葬品堆积散乱，包括铜钱、铜弩机、铜铃、彩绘陶女俑、陶灶、陶屋顶、陶九枝灯、釉陶壶、陶勺、石兽、骨发卡等，另有釉陶碗、盘、盆等残片和棺钉。简报判断该墓年代为魏晋时期<sup>①</sup>。此墓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前室的壁画石龕，为其独有之物。此物出现的原因必与墓葬的时代背景及墓主人身份密切相关，本文试就此做些探讨。

## 一 “晋制”背景下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年代范围

八角村魏晋墓没有出土纪年物品，其年代范围的较准确定位依赖于北京地区魏晋墓葬演变序列

① 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墓》，《文物》2001年第4期。





的建立。从现在公布的情况看，北京地区魏晋墓有海淀区八里庄魏晋墓<sup>11</sup>、海淀区景王坟M1和M2<sup>12</sup>、石景山区华芳墓<sup>13</sup>、石景山区老山晋墓<sup>14</sup>、顺义区大营村8座晋墓<sup>15</sup>、房山区小十三里晋墓<sup>16</sup>、昌平区沙河镇晋墓<sup>17</sup>、密云县大唐庄晋墓<sup>18</sup>、延庆县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葬<sup>19</sup>等。其中，顺义大营村M8出土“泰始七年”(271)纪年铭文砖，属于西晋初期墓葬；华芳为西晋幽州刺史王浚之妻，下葬时间为西晋永嘉元年(307)；老山晋墓的墓室南侧并排出土了三块长方形石墓志，志文总计250字，记载了三个不满周岁的婴儿的生卒年代以及于“永嘉元年”(307)二次迁葬到此合葬的情况。这些纪年资料对我们判断北京地区西晋初期和晚期墓葬的特征很有帮助，但由于公布资料的不全面和年代的缺环，还不足以支持完整演变序列的建立。这种情况下，对墓葬演变趋势的研究就势在必行，这也是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意义所在。而魏晋墓葬演变趋势就是指在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所显示出来的共同文化特征和变化规律，简言之，可谓为“晋制”。

“晋制”是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1979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上提出的一个崭新概念，认为墓形制度从“周制”到“汉制”以及向“晋制”的递变，反映了社会历史变化的三个阶段，其论文对“周制”、“汉制”的阐释较多，未遑及对“晋制”的具体内涵展开阐发<sup>10</sup>。1991年，俞先生借讨论中国魏晋墓制与日本古坟的关系问题，对晋制墓葬的特征作了进一步表述和归纳<sup>11</sup>。此后，韩国河<sup>12</sup>、吴桂兵<sup>13</sup>等继续关注和解释这一概念，将“晋制”内涵扩展到丧制和葬制两个层面。“晋制”的相关讨论使我们认识到，“晋制”是“汉制”之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是在不断摆脱“汉制”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晋制”首先确立的地区是当时魏晋国家推行新礼制的中心——都城洛阳及其

〈1〉 胡传耸：《北京地区魏晋南北朝墓葬述论》，《文物春秋》2010年第3期。

〈2〉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两座西晋墓》，《考古》1964年第4期。

〈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

〈4〉 王武钰：《石景山老山西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页73，文物出版社，1984年。

〈5〉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6〉 前揭《北京地区魏晋南北朝墓葬述论》。

〈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昌平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博》2010年第3期。

〈8〉 前揭《北京地区魏晋南北朝墓葬述论》。

〈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延庆县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北京考古》第二辑，页120—127，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10〉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页337，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 俞伟超：《中国魏晋墓制并非日本古坟之源》，同氏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页359—369，文物出版社，2002年。

〈12〉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页71—8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 吴桂兵：《晋代墓葬制度与两晋变迁》，《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





邻近，然后再向其他地区扩展，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墓葬特征；由于丧礼很难在考古发现中获得证据，魏晋墓葬地表又施行不封不树，所以我们能够从考古资料中提炼的“晋制”特征，主要是指地下墓葬所包含的内容，具体而言是指墓葬的形制和所出随葬品。“晋制”的理论积累，为我们推定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提供了指导。洛阳地区作为“晋制”的确立地，其魏晋墓葬的演变体系对其他地区而言具有标杆参照作用。

张小舟<sup>①</sup>、徐殿魁<sup>②</sup>、朱亮<sup>③</sup>等曾先后对洛阳魏晋墓的演变阶段和特点进行过分析和总结，本文尝试结合新的资料来丰富和调整这方面的研究。洛阳地区曹魏墓，常常被人提起的是偃师杏园村6号墓<sup>④</sup>和洛阳涧西16工区M2035<sup>⑤</sup>两座墓葬。前者从出土陶壶和方盒的情况看，更似是东汉晚期墓葬，暂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畴。后者为前、后双主室结构砖室墓，前室近方形，后室为长方形，前室南、北各设有1个耳室〔图二〕，所出的铁帷帐架上刻有“正始八年八月”的铭文，是曹魏后期墓葬。最近发现的可以肯定属于曹魏时期的墓葬，是孟津县宋庄乡三十里铺村的曹休墓，墓中出有一方篆书白文“曹休”二字的铜印〔图一：1〕。曹休卒于曹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可算作墓葬的绝对年代，无疑是曹魏前期墓葬。该墓坐西朝东，为前、后双主室结构砖室墓，甬道入口上方有照壁，前室近方形，后室为长方形，前室设有1个东耳室、1个北侧室、2个南侧室〔图一：2〕<sup>⑥</sup>。从曹休墓的形制可以看到其受到东汉晚期墓葬的明显影响，如在前室设置与墓道平行的耳室；另外前室和北、南侧室连在一起，仍如东汉墓葬宽敞的前堂，到曹休墓则是分隔成南、中、北三区四室。从曹休墓到涧西16工区M2035，前、后双主室结构基本相同，侧室或耳室减少，总体来看，双主室结构下的多室墓是曹魏贵族墓葬的主流。曹休墓残存的随葬陶器有碗、盆、盘、勺、耳杯、四系罐、奩残片、博山炉盖、灯等，还有铜印、铜带钩、铜权、铜钱、铁削、铁镜、石砚板等。下文我们主要总结曹魏后期至西晋时期洛阳墓葬的发展情况。

曹魏后期的代表墓葬，即涧西16工区M2035。本文将该墓形制作为A型墓的起始，列为AI式〔图二〕。其随葬品可分为四类：生活用具类，包括双沿陶罐、四系陶罐、陶奩、陶案、陶耳杯、陶勺、陶盘、陶盆、陶碗、陶豆形灯、陶熊柱灯、铁豆形灯、铁帷帐架、三足式铜博山炉、铜销(洗)、玉杯、石砚板等；

① 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② 徐殿魁：《试述洛阳地区曹魏墓的分期问题》，《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

③ 朱亮、李德方：《洛阳魏晋墓葬分期的初步研究》，《洛阳考古四十年——一九九二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78-290，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

⑤ 李宗道、赵国璧：《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

⑥ 严辉：《曹操墓和曹休墓的比较与研究》，《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5版；同氏著：《洛阳东汉帝陵陵园和曹魏贵族墓》，《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页115-119，文物出版社，2011年。





〔图一〕曹休墓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铜印章  
1.“曹休”铜印章 2.墓葬全貌近景



1



2

模型明器类，全为陶制，包括井、猪圈(内有猪)、灶、磨、碓；家畜俑类，包括陶鸡、陶狗；侍从俑类，包括男、女陶俑，袖手而立，袍服及地〔图四〕。其中，双沿罐、四系罐、熊柱灯、双钮三足式铜博山炉、石砚板、男女侍俑组合都是不同于洛阳东汉墓的新特点。另外，邻近洛阳的巩义市站街镇晋墓<sup>〔1〕</sup>，是由前、中、后三室组成的砖室墓，前、中室近方形，后室为长方形〔图二〕；从随葬品摆列情况看，是以中、后室为主，这二室的组合正与16工区M2035的主室结构相似；不过，前、中室近方形的组合又开启了B型墓，本文因此将站街墓列为BI式〔图二〕；所出随葬品也分为四类，四系陶罐、陶盆、陶碗、铜洗、石砚板、模型明器、家畜俑、男女侍从俑等均与16工区M2035基本相同，三足式铜博山炉器形不变、双钮变单钮，新出现双耳陶罐、双耳瓷罐、铜三子钗、陶屋形仓、陶鸭、方形帐座等，神兽形铜砚滴颇具特色〔图四〕。总体来看，巩义站街墓与16工区M2035特征相近，年代相去不远，可能稍晚些，应调整为曹魏后期，接近西晋初期。另外，焦作山阳北路M2<sup>〔2〕</sup>是一座近长方形单室土洞墓，本文列为CI式〔图二〕，该墓出土的石砚板、四系陶罐、男女侍从俑、神兽形铜砚滴等均与巩义站街墓近乎相同，时代也应为曹魏晚期。

进入西晋后，除了A型、B型、C型墓葬继续发展，还主要可以见到D型、E型、F型三种墓形。A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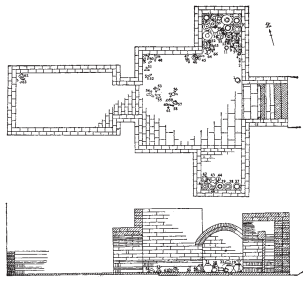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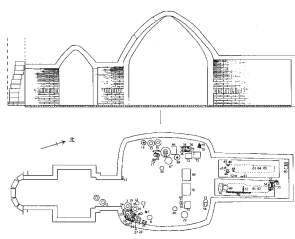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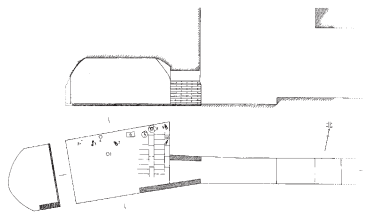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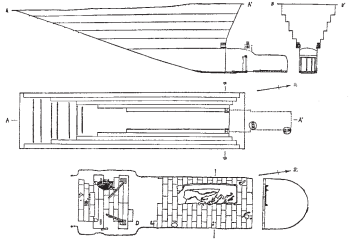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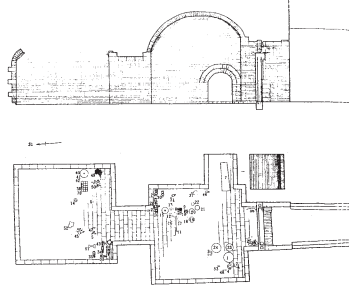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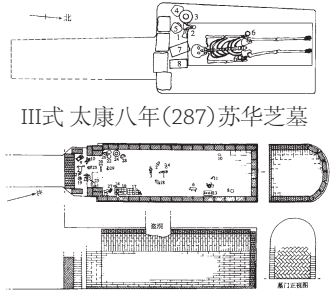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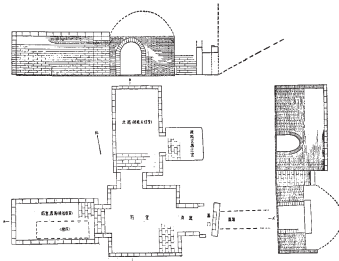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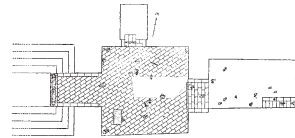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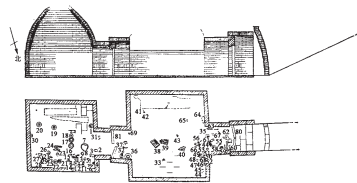

〔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巩义站街晋墓》，《文物》2004年第11期。

〔2〕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焦作山阳北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9期。





〔图二〕洛阳地区魏晋墓葬形制分期(一)

	A型	B型	C型
曹魏后期	 <p>I式 洛阳涧西16工区M2035</p>	 <p>I式 巩义站街墓</p>	 <p>I式 焦作山阳北路M2</p>
西晋早期			 <p>II式 偃师枕头山崇阳陵陪葬墓M4</p>
西晋中期		 <p>II式 洛阳谷水FM4</p>	 <p>III式 太康八年(287)苏华芝墓 IV式 孟津三十里铺M117</p>
西晋中晚期	 <p>II式 元康三年(293)裴祗墓</p>  <p>II式 永宁二年(302)士孙松墓</p>  <p>III式 洛阳西郊58LSM3088</p>	 <p>IIIa式 偃师杏园M34</p>  <p>IIIb式 洛阳东郊M177</p>	





式墓的代表是永宁二年(302)的士孙松墓<sup>11</sup>，为土洞墓，前室近方形、后室长方形的结构不变，前室耳室减为1个〔图二〕。元康三年(293)大司农裴祗墓<sup>12</sup>，砖室墓，通常被大家视作多室墓，实际上它是两个AII式墓的拼合体，裴祗夫妇与其母同葬，因尊母之故，以正向的西后室安放母亲，侧向的北后室才是裴祗夫妇，北后室又开一耳室安置其女〔图二〕。发展到AIII式时，已没有耳室，如洛阳西郊58LSM3088，砖室墓，墓室壁面弧起〔图二〕<sup>13</sup>。BII式墓的代表是洛阳谷水晋墓FM4，砖室墓，前、后方形双主室结构，前室开有一耳室〔图二〕<sup>14</sup>。到BIII式墓，耳室消失了，基本上是砖室墓，还可分为二亚式：BIIIa式的墓室四隅无向墓室内凸起的砖柱，如偃师杏园M34〔图二〕<sup>15</sup>；而BIIIb式则有，如洛阳东郊M177〔图二〕<sup>16</sup>。长方形单室的C型墓呈现出由土洞墓向砖室墓发展的趋势。这型墓的形制虽然简单，但在CII式时，却是属于高等级墓葬，如偃师枕头山M4，为晋文帝司马昭崇阳陵的陪葬墓<sup>17</sup>。该墓为土洞墓，墓室长仅4.7、宽仅1.9米，却有着宏大的墓道，墓道上口长26.3、宽6.3米，两侧各有五级的生土台阶〔图二〕。这种墓室与墓道比例失调的墓葬，皆因于帝陵的薄葬。“宣帝(司马懿)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司马师)、文(司马昭)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sup>18</sup>。但墓室虽然简化了，随葬品也少了，等级却不能丢，墓道的宏大与生土台阶的级差深深体现着身份的高低。CIII式墓，墓室与墓道比例协调，小型的长方形土洞墓结构与墓主人的身份是匹配的，如太康八年(287年)苏华芝墓〔图二〕<sup>19</sup>。CIV式墓，演变成为砖室墓，墓室更为瘦长，如孟津三十里铺M117〔图二〕<sup>10</sup>。D型墓为方形单室砖墓，无侧室或耳室，可分为二亚型：Da型的墓室四隅有向墓室内凸起的砖柱，如太康八年(287)洛阳晋墓M1〔图三〕<sup>11</sup>、

〈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墓志记载墓主身份为“晋前尚书郎北地傅宣故命妇秦国士孙松字世兰翊军府君之女”，原报告断句为“秦国士、孙松，字世兰”。后经陈直先生考证，士孙为复姓，为扶风(晋惠帝时改为“秦国”)大族，此说甚是，但他又错误理解墓主为“士孙松之女”，把“翊军府君”当成了士孙松的官职(参见陈直：《对“洛阳晋墓的发掘”与“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两文的意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实为“秦国”的“士孙松，字世兰，翊军府君之女”，其父才是“翊军府君”。

- 〈2〉 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晖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第1期。
- 〈3〉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晋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11期。
- 〈4〉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文物》1996年第8期。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
- 〈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郊两座魏晋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 〈8〉 《晋书》卷二十《礼志中》页633，中华书局，1974年。
- 〈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西晋苏华芝墓》，《文物》2005年第1期。
- 〈10〉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三十里铺西晋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 〈1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元康九年(299)贾皇后乳母徐美人墓〔图三〕<sup>43</sup>、洛阳春都路IM1568〔图三〕<sup>42</sup>等；而Db型没有，如洛阳关林皂角树C7M1874〔图三〕<sup>3</sup>。E型墓为方形单主室墓，设有一个耳室，可分为三式：EI式耳室较大、较长，可分为二亚式，EIa式的耳室偏于一隅，一壁与主室前壁连成一条直线，如新安晋墓C12M262，为砖室墓〔图三〕<sup>44</sup>；EIb式耳室位置较靠中，如洛阳东郊M178，为土洞墓〔图三〕<sup>45</sup>。EII式耳室变小、变短，二亚式耳室位置分别与EI式的二亚式对应，如EIIa式的洛阳太原路CM2360〔图三〕<sup>6</sup>、EIIb式的洛阳谷水FM5〔图三〕<sup>7</sup>和洛阳西郊58LGCM3005〔图三〕<sup>8</sup>等；EIII式仅存假耳室，实用功能已经消失，如新安晋墓M27，为砖室墓，在墓室西壁做出假耳室的门，也以砖封门〔图三〕<sup>9</sup>。F型墓为长方形单主室墓，两侧各有一个耳室，分为二式：FI式耳室较大、较长，如洛阳谷水FM6，为土洞墓〔图三〕<sup>10</sup>；FII式耳室变小、变短，如洛阳谷水FM38，为砖室墓〔图三〕<sup>11</sup>。

从随葬品的情况看，新安晋墓C12M262和洛阳东郊M178的特点比较相近。男、女侍俑都延续了曹魏后期的特点，袖手而立，袍服及地；新增加了一手高举(或为刀剑)、一手持盾的镇墓武士俑，有的单腿跪踞，有的正身跨立。模型明器、家畜俑较之曹魏后期，没有明显的变化，家畜俑稳定为陶鸡、陶狗组合。生活用具方面，新安晋墓C12M262与曹魏后期基本相同，洛阳东郊M178则出现双耳的宽折沿陶壶、陶空柱盘这样的新式器物〔图五〕。以上二墓既大量保持了曹魏后期的器物特点，又显示出新的器物种类，时代应离曹魏不远，当属于西晋早期。

西晋中期是晋墓进一步摆脱曹魏墓葬特点、形成更多自有特点的时期，呈现出新、旧杂陈的文化面貌，新的因素明显增多，但相互组合还不稳定。我们选取了洛阳谷水FM4、FM5、FM6、洛阳太原路CM2360、孟津三十里铺M117五座墓葬的随葬品作为讨论对象。生活用具方面，曹魏以来的双沿罐、四系罐、熊柱灯、石砚板继续存在且没有多大变化，双耳罐的耳部由纵耳变成横耳，三足式铜博山炉的盖顶由尖变圆，有的墓恢复为陶博山炉，似无盖；西晋早期以来的空柱盘没有变化，宽折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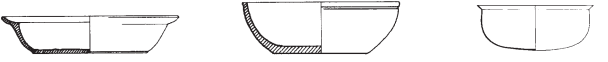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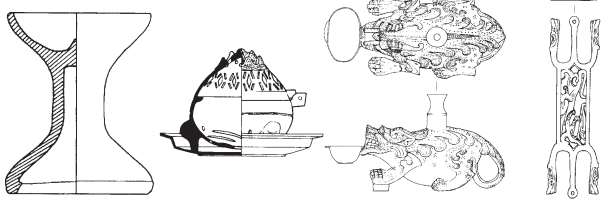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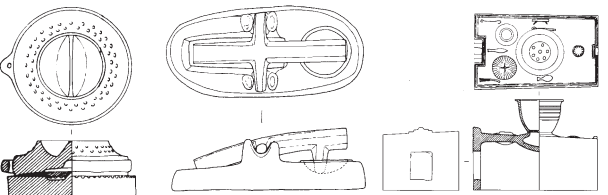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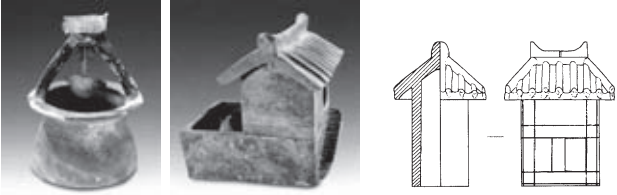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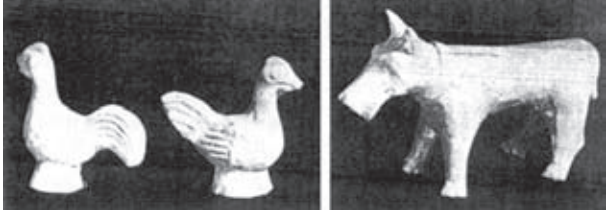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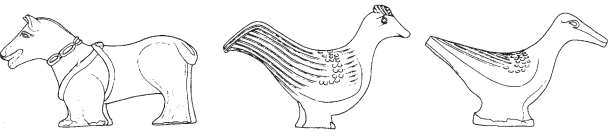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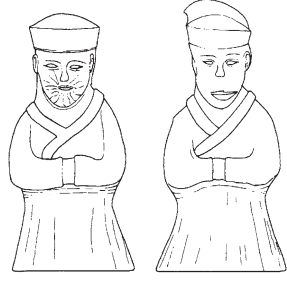
- 
- 〈1〉 前揭《洛阳晋墓的发掘》。
  - 〈2〉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春都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0期。
  - 〈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关林皂角树西晋墓》，《文物》2007年第9期。
  -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2期。
  - 〈5〉 前揭《洛阳市东郊两座魏晋墓的发掘》。
  - 〈6〉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太原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2期。
  - 〈7〉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FM5)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 〈8〉 前揭《洛阳西郊晋墓的发掘》。
  - 〈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县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1期。
  - 〈10〉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FM6)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 〈1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FM38)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9期。

[图三] 洛阳地区魏晋墓葬形制分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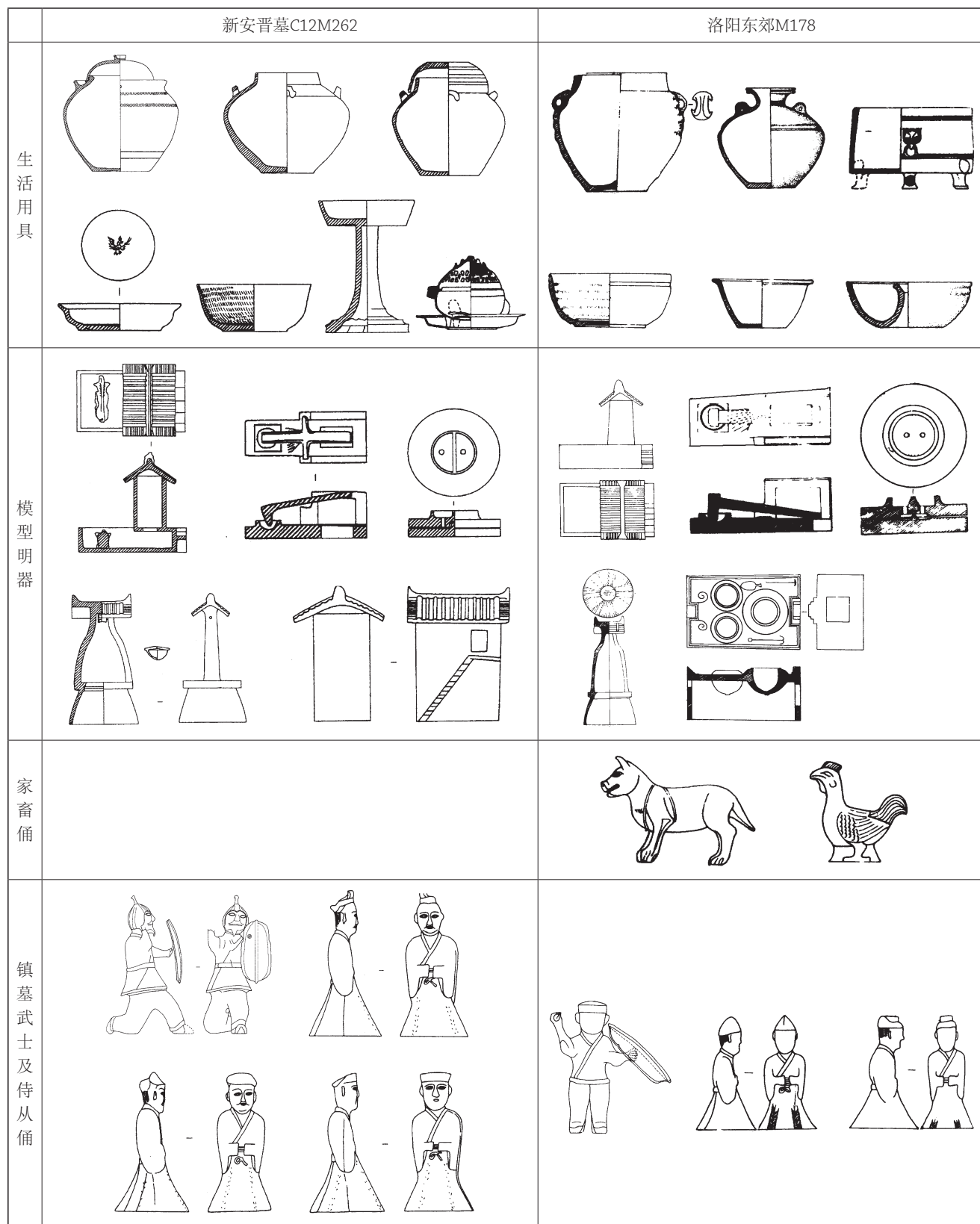
	D型	E型	F型
曹魏后期			
西晋早期		<p>Ia式 新安C12M262    Ib式 洛阳东郊M178</p>	
西晋中期	<p>Da型 太康八年(287)洛阳晋墓M1</p>	<p>IIa式 洛阳太原路CM2360 IIb式 洛阳谷水FM5</p>	<p>I式 洛阳谷水FM6</p>
西晋晚期	<p>Da型 元康九年(299)徐美人墓 Da型 洛阳春都路IM1568 Db型 洛阳关林皂角树C7M1874</p>	<p>IIb式 洛阳西郊58LGCM3005 IIb式 洛阳春都路IM1568 III式 新安晋墓M27</p>	<p>II式 洛阳谷水FM38</p>



〔图四〕洛阳地区曹魏后期墓葬随葬品举例

	涧西16工区M2035	巩义站街墓
生活用具	  	  
模型明器	 	 
家畜俑		
侍从俑		

〔图五〕洛阳地区西晋早期墓葬随葬品举例





陶壶变成无耳；新增多子桶、直颈微敛的无耳罐。模型明器、家畜俑延续前期特点。人物俑及相关组合的变化最为直观。镇墓武士仍见前期那样的单腿跪踞或跨立者，新出现前腿大步跨出、后腿绷直的形象，有的将腿部简化成板状；新增与镇墓武士相配的镇墓兽，但有的墓有、有的没有。新出现牛车、鞍马，但没有形成固定组合，有牛车的未见鞍马，有鞍马的未见牛车。男、女侍俑站姿不变，服饰发生明显变化，谷水FM5继续前期的袍服及地，时代离西晋早期最近；太原路CM2360的男侍俑改成无袍的裤装，女侍俑仍为袍服及地；谷水FM4的男侍俑，有的短袍露裤，有的直接着外裤；孟津三十里铺M117的男侍俑直接着外裤，女侍俑短袍露裤〔图六、图七〕。

西晋晚期，“晋制”墓葬的特点确立起来。最明显的标志是人物俑相关的三种组合固定下来，而且通常共出。这三个组合是：武士俑与镇墓兽组合；牛车与鞍马组合；裤装男侍俑与袍服女侍俑组合。墓例可见春都路IM1568、关林皂角树C7M1874、新安晋墓M27、偃师杏园M34等。生活用具方面，双沿罐、双耳罐消失，四系罐、直颈微敛的无耳罐、空柱盘、多子桶继续存在，仍见有熊柱灯、陶博山炉，新增束颈侈口罐、酱釉小壶和带支脚、双钮耳的方形小扁壶等。模型明器变化不大，有的墓葬陶猪圈消失，原放在猪圈中的陶猪尺寸增大，独立出来与陶鸡、陶狗形成组合，如偃师杏园M34〔图八、图九〕。

结合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的演变，以及几座纪年墓的正始八年(247)、太康八年(287)、元康三年(293)、元康九年(299)、永宁二年(302)年号的分布，可将曹魏后期与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在位时期(240—265)相当，西晋早期与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80)相当，西晋中期与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90)相当，西晋晚期与晋惠帝时期至晋怀帝永嘉五年洛阳被焚毁(290—311)相当。相应的，把AI式、BI式、CI式墓列在曹魏后期，CII式、E1a式、E1b式墓列在西晋早期，BII式、CIII式、CIV式、Da型、EIIa式、EIIb式、FI式墓列在西晋中期，AII式、AIII式、BIIIa式、BIIIb式、Da型、Db型、EIIb式、EIII式、FII式墓列在西晋晚期〔图二、图三〕。

分析洛阳“晋制”墓葬的发展，我们看到墓葬形制呈现出由近方形前室、长方形后室的双主室(个别为三主室，后室也为长方形)结构向方形的、前、后双室或单室结构演变的过程，后室由长方形转为方形或消失是墓葬主体结构最主要的变化；长方形单室墓不多，到西晋中晚期渐被方形单室墓所替代；较早的墓葬有两个或以上的侧室，越往后越少，尺寸缩小成为耳室，到最后基本消失。依照这种演变趋势，我们可对北京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结构进行型式排队。根据墓室数量和形状的不同，可分为四型〔图十〕。

#### A型 多主室墓

三个或两个主室，直壁。依墓室数量和形状的不同，可分为四式。

I式 前、中、后三室，前、后室平面呈长方形，中室平面呈方形，甬道偏于一侧，一壁面与三墓室同壁，连成直线。如顺义大营村M3。

II式 前、后双室，前室平面呈方形，后室平面呈长方形，在前室甬道开一长方形耳龕，甬道



〔图六〕洛阳地区西晋中期墓葬随葬品举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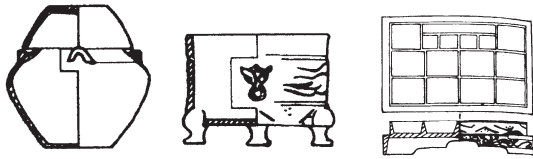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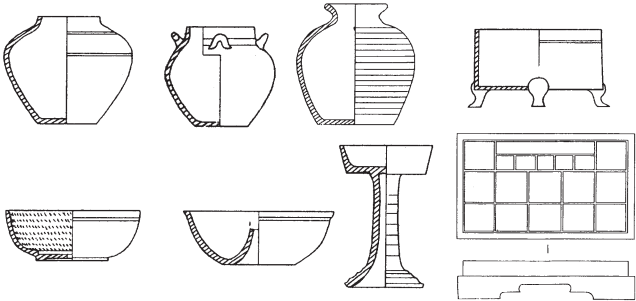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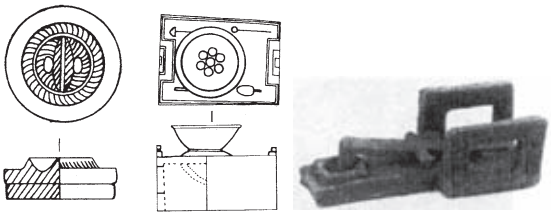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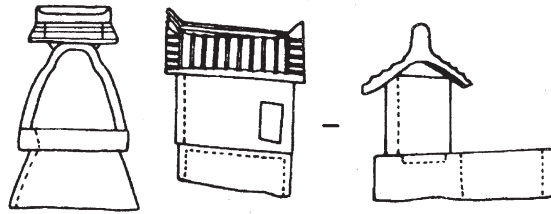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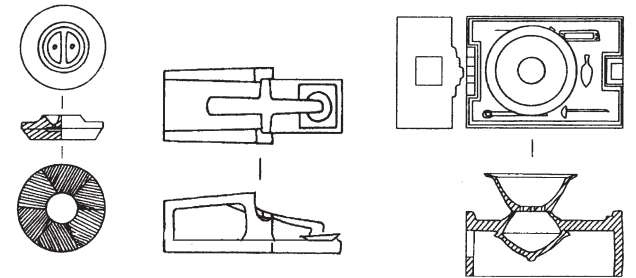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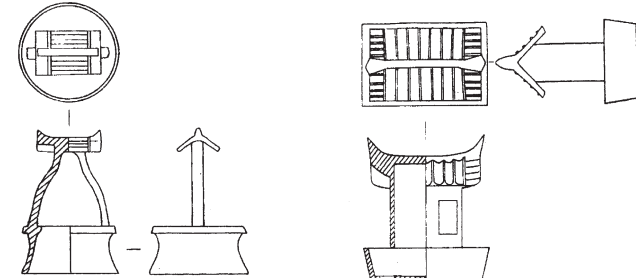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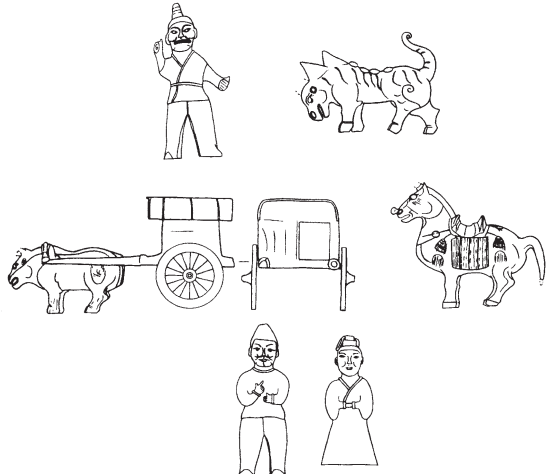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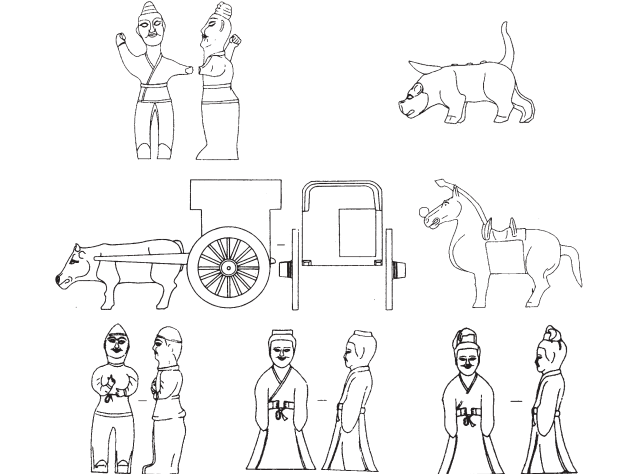
	洛阳谷水FM5	洛阳太原路CM2360	洛阳谷水FM4
生活用具			
模型明器			
家畜俑			
镇墓组合、车马组合及侍从俑			



〔图七〕洛阳地区西晋中期墓葬随葬品举例(二)

	洛阳谷水FM6	孟津三十里铺M117
生活用具		
模型明器		
家畜俑		
镇墓组合、车马组合及侍从俑		

[图八] 洛阳地区西晋晚期墓葬随葬品举例(一)

	洛阳春都路IM1568	洛阳关林皂角树C7M1874
生活用具		
模型明器	 	 
家畜俑		
镇墓组合、车马组合及侍从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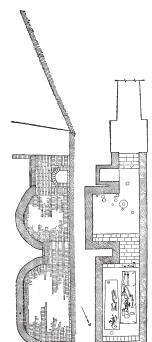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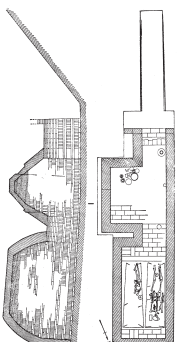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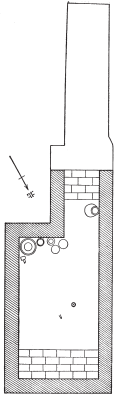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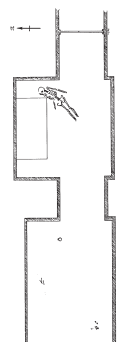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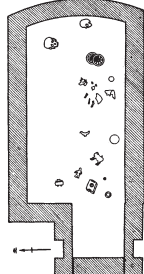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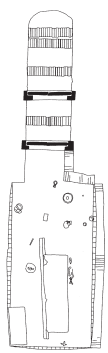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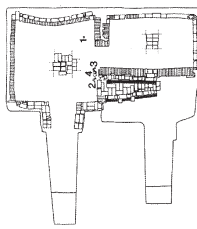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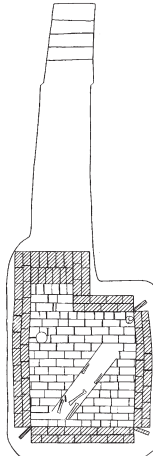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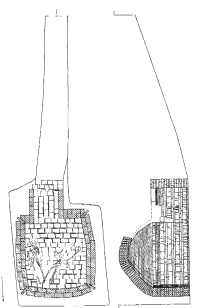


〔图九〕洛阳地区西晋晚期墓葬随葬品举例(二)

	新安晋墓M27	偃师杏园M34
生活用具		
模型明器		
家畜俑		
镇墓组合、车马组合及侍从俑		



(图十)北京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形制分期

	A型	B型	C型	D型
曹魏后期	 I式 大营村M3			
西晋早期	 II式 大营村M4			
西晋中期	 III式 大营村M2	 I式 大营村M7		
西晋晚期	 IV式 八角村魏晋墓	 II式 景王坟M2	 I式 华芳墓	 沙河镇晋墓M41
十六国时期		 IV式 东王化营M14	 II式 东王化营M13	



偏于一侧，一壁面与二墓室同壁，连成直线。如顺义大营村M4。

III式 基本同II式，只是无耳龕。如顺义大营村M2。

IV式 前、后双室，前室平面呈方形，后室平面呈长方形，甬道位置较偏，侧壁与墓室壁错开，不成直线。如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

B型 刀形单室墓

仅有一室，甬道偏于一侧，一壁面与墓室同壁，连成一线。依墓室形状和壁面情况的不同，可分为四式。

I式 长方形墓室，直壁，甬道与墓室的连壁成一直线。如顺义大营村M7。

II式 长方形墓室，墓室两侧壁为直壁，后壁向外弧起，甬道与墓室的连壁成一直线。如景王坟M2。

III式 长方形墓室，墓室两侧壁和后壁均向外弧起，甬道与墓室的连壁成一曲线。如景王坟M1。

IV式 方形墓室，墓室两侧壁向外弧起，甬道与墓室的连壁成一曲线。如延庆东王化营M14。

C型 铲形单室墓

仅有一室，甬道位置比较靠向中间，墓室两侧壁和后壁均向外弧起。依墓室形状不同，可分为二式。

I式 长方形墓室。如华芳墓。

II式 方形墓室。如延庆东王化营M13。

D型 单主室墓

一主室二侧室，主室平面呈方形，二侧室平面均呈长方形、两侧壁微外弧，主室甬道居中。如昌平沙河镇西晋M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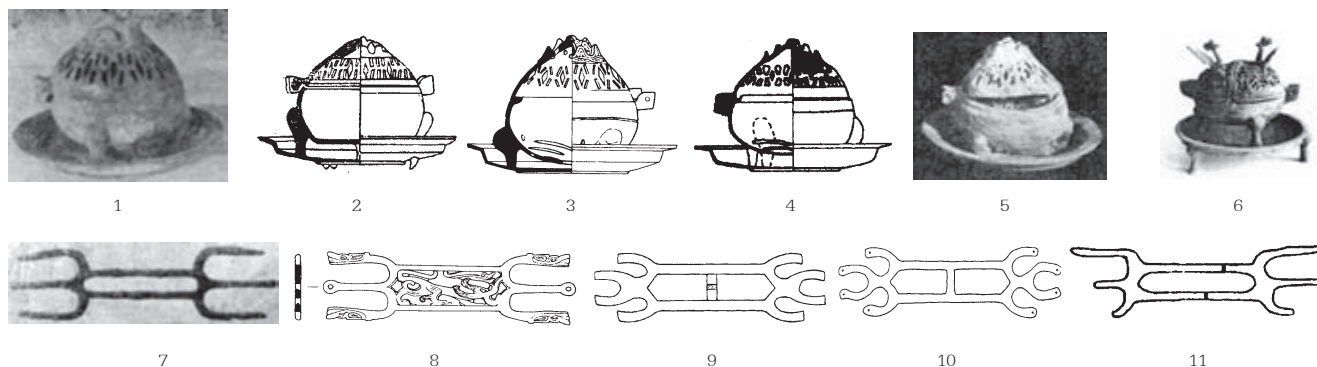
对上述墓葬演变序列的断代，可利用两个纪年材料。一是顺义大营村M8出土的“泰始七年夏四月作砖”的砖铭，简报说AII式墓大营村M4、AIII式墓大营村M2都与M8形制相似，那么按照M8的纪年，M4、M2的年代应与之接近；考虑到M4、M2之间还存在演变关系，有一定的时间差，我们把M4作为西晋早期墓，M2年代或可晚到西晋中期。二是华芳墓所出墓志，上书“永嘉元年四月十九日己亥造”，明确表明CI式的该墓属于西晋晚期。

除此之外，其他墓葬的年代推定，需要另外参照洛阳“晋制”墓葬的特点。AI式墓大营村M3的三室结构与洛阳曹魏后期的巩义站街墓〔图二〕相似，演变序列又在西晋早期的大营村M4、M2之前，故把大营村M3列为曹魏后期墓葬。BI式墓大营村M7出土的单钮、三足式铜博山炉〔图十一：1〕属于魏晋较早时期的器物，洛阳地区见于曹魏后期的涧西16工区M2035〔图十一：2〕和巩义站街墓〔图十一：3〕、西晋早期的新安晋墓C12M262〔图十一：4〕，尤其后二墓所出单钮式与大营村M7几乎一样；到西晋中期，洛阳地区的三足式铜博山炉的炉盖造型有较大变化，如谷水FM4所出〔图十一：6〕；但是在北京地区西晋晚期的墓葬，如华芳墓中还出土与大营村M7相同的单钮式铜博山炉〔图



【图十一】顺义大营村M7出土铜器及相关比较

1、7、顺义大营村M7 2、河西16工区M2035 3、8、巩义站街墓 4、新安晋墓C12M262  
5、华芳墓 6、洛阳谷水FM4 9、焦作山阳北路M2 10、洛阳华山路CM2349 11、支伯姬墓



十一：5)。另外，该墓还出一件铜三子钗〔图十一：7〕，与曹魏后期巩义站街墓所出的〔图十一：8〕设计类似，但不如后者精致；同为曹魏晚期的焦作山阳北路M2还出现一种四子钗〔图十一：9〕，至少延用到西晋中期，如洛阳华山路CM2349：31〔图十一：10〕<sup>①</sup>，比较简朴；到西晋晚期时，洛阳永康元年(300年)支伯姬墓的三子钗〔图十一：11〕<sup>②</sup>与大营村M7所出最像。总体来说，洛阳三子钗到西晋时期呈现出简约化的特点。由于铜器使用时间较长，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与埋入墓葬的时间存在时差，华芳墓的单钮式铜博山炉、支伯姬墓的三子钗都可能是早些时候制作的；同时，结合大营村M7在型式序列中位置居前的情况，我们把该墓的年代列在西晋中期。BII式墓景王坟M2中，牛车与鞍马并存，男侍俑着无袍服的裤装，还有带支脚、双钮耳的方形小扁壶；BIII式墓景王坟M1型式序列比景王坟M2晚，男侍俑也着无袍服的裤装，还有酱釉小陶壶〔图十二：3〕；这两墓都符合洛阳西晋晚期墓葬的特征。D型沙河镇晋墓M41二侧室中较大的那室与景王坟M1形制相同，故也列为西晋晚期墓葬。BIV式墓东王化营M14、CII式东王化营M13是两座方形单室墓，其出现时间比洛阳地区晚，属于十六国早期的可能性较大，可早到西晋晚期。

在北京地区所形成的这套演变系统中，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在甬道与墓室的位置关系上，明显区别于AI式、AII式、AIII式、B型诸墓，而最接近C型墓〔图十〕；另外，该墓出土的石兽〔图十二：6〕形似西晋晚期偃师杏园M34所出陶羊〔图十二：5〕，也出有与新安晋墓M27〔图十二：1〕、偃师杏园M34〔图十二：2〕、景王坟M1〔图十二：3〕同类的酱釉小陶壶〔图十二：4〕。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特征共同表明，该墓的年代为西晋晚期，考虑改朝换代时文化面貌不会立即转型的因素，其下限可到十六国初期。

西晋时期，由于提倡薄葬，墓葬之间的等级界限不甚清晰，身份高的人可以选择对等的葬制，

①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华山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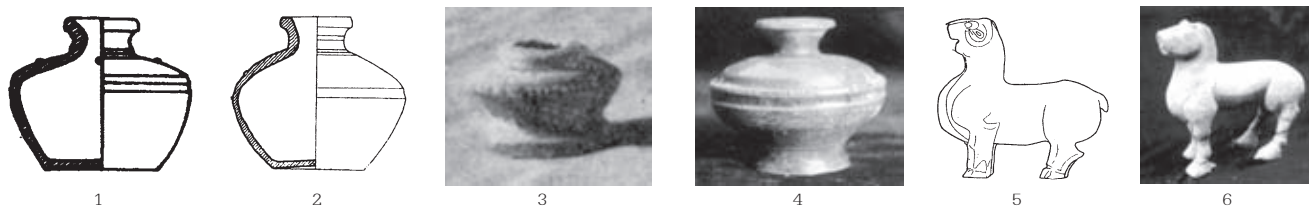
②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西晋支伯姬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3期。





〔图十二〕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出土器物及相关比较

1、新安晋墓M27 2、5、偃师杏园M34 3、景王坟M1 4、6、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



也可以选择未必体现身份的简朴葬制。在西晋早期，土洞墓等级并不一定比砖室墓低，陪葬帝陵的长方形土洞墓配有宏大的墓道，反而是极少数高官和贵族才能享有的殊荣。前、后双室墓也不必然等级高于单室墓，如晋惠帝、贾皇后特加关照的徐美人墓就是一座单室墓。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前、后双室墓的等级不会低，是品级较高者才有能力建造的。发掘简报认为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墓主身份在刺史上下，是值得肯定的。

在北京地区，还有华芳墓可作比照。她作为幽州刺史王浚的妻子，使用的是长方形砖室墓，但王浚亲撰的墓志铭明言“先公旧墓在洛北邙，文、卫二夫人亦附葬焉。今岁荒民饥，未得南还。辄权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依高山显敞，以即安神枢。魂而有灵，亦何不之。选吉日，备车从，介士随命秩所应，具三府之仪，使不衍旧典而有加礼也”。可见，王浚当时埋葬华芳只是临时“假葬”，“殡葬之制，事从节约”（华芳墓志语），等日后有机会迁附洛阳祖茔时，再不受薄葬典制的限制而隆重下葬。可见，如果是正式安葬，刺史或刺史夫人所使用的规模更大些的墓葬形制就应该是前、后双室墓。

## 二 石龕壁画的文化源流

八角村墓前室的石龕壁画〔图十三：15〕，正壁（北壁）图像以执麈尾的墓主人正坐于榻上为中心，两侧各有一侍女，一人捧物，一人执拂尘〔图十三：16〕；西壁上绘牛耕图〔图十三：17〕，下绘篷车图；东壁画面不清，正中绘一曲足条案，旁侧似有一侍女；龕顶绘日、月，圆圈内分别是三足乌、蟾蜍。这组壁画的核心就是墓主人坐像。墓主人画像题材已知年代最早的是战国时期，为站立之姿，进入东汉后大量流行起来<sup>〔1〕</sup>，有屋宇下、帷帐中或坐榻上的静坐或交谈的形象，也有乘坐车马出行的行进形象。本文简要总结东汉至北魏时期墓主人静坐像的发展阶段和特点，以判断八角村墓石龕壁画的文化源流。

东汉阶段，可分中原和东北两地区来考察。中原地区的静坐态墓主人像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

〔1〕 郑岩：《墓主画像研究》，《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页450—468，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男墓主人或女墓主人独自正坐，或袖手，或一手执便面，两旁有男、女侍从，场景广阔者可见官吏拜谒和歌舞伎乐图等，如山东诸城前凉台东汉墓画像石〔图十三：1〕<sup>11</sup>、河北安平逐家庄东汉熹平五年(176)墓中室右侧室壁画〔图十三：2〕<sup>12</sup>、河南新安县铁塔山东汉墓后壁壁画〔图十三：3〕<sup>13</sup>等。二是墓主人夫妇同坐，男墓主人可正坐也可侧坐，女墓主人通常是稍微侧坐，两旁也有男、女侍从，如山东微山县两城乡出土的东汉永和四年(139)画像石〔图十三：4〕<sup>14</sup>、河南洛阳市朱村东汉墓北壁壁画〔图十三：5〕<sup>15</sup>等。在朱村壁画中，首次出现了麈尾，但并非墓主人所执，而在男侍从之手。东北地区的墓主人画像基本是侧身而坐，常见男、女墓主人分榻斜对坐的场景，如辽宁辽阳市三道壕窑业第二现场令支令张君墓〔图十三：6〕<sup>16</sup>、三道壕窑业第四现场壁画墓〔图十三：7〕<sup>17</sup>、棒台子屯壁画墓〔图十三：8〕<sup>18</sup>、北园1号墓〔图十三：9〕<sup>19</sup>等。

魏晋阶段，由于薄葬的倡行，中原地区的墓葬基本没有壁画，所以八角村墓石龕壁画的出现是当时、当地风俗下十分罕见的事物。西北的凉州地区是壁画墓的集中地，通常绘于小砖之上，称为画像砖墓。墓壁绘大幅壁画的墓葬很少，目前所知资料详细的是酒泉丁家闸5号墓，此墓时代以前定为十六国时期<sup>20</sup>，现有研究者改定为魏晋时期<sup>21</sup>。该墓前室西壁壁画绘墓主人侧坐于瓦顶建筑之下的榻上，手持麈尾，旁有男女侍从、宴饮的桌案和食器，以及舞乐杂技〔图十三：10〕<sup>22</sup>，墓主人的坐姿和相关画像内容都比较符合东汉时期的特点。凉州魏晋壁画墓里，牛耕和牛车的图像比较常见，如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壁画〔图十三：11〕<sup>23</sup>、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M7砖画〔图十三：12〕<sup>24</sup>

〈1〉 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第10期。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安平东汉壁画墓》页25—26，文物出版社，1990年。

〈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新安县铁塔山汉墓发掘报告》，《文物》2002年第5期。黄明兰、郭引强编著：《洛阳汉墓壁画》页181—186，文物出版社，1996年。前者将时代定在王莽时期，后者定为东汉时期。该墓侧壁绘七盘舞，应以东汉为确。

〈4〉 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页30—31，文物出版社，2003年。

〈5〉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朱村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2期。前揭《洛阳汉墓壁画》页187—209，文物出版社，1996年。

〈6〉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7〉 前揭《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

〈8〉 前揭《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

〈9〉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页24—26，文物出版社，2002年。

〈1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页11，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 韦正：《试谈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的时代》，《文物》2011年第4期。

〈12〉 前揭《酒泉十六国墓壁画》页14。

〈13〉 前揭《酒泉十六国墓壁画》页13。

〈14〉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研究所编：《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图版七三：2，文物出版社，1985年。





等。东北地区也有壁画墓出现，如辽阳上王家村晋墓，右耳室南壁绘男墓主人正坐于榻、手持麈尾，旁有侍从〔图十三：13〕，左耳室北壁绘车马出行，其中牛车居中而行〔图十三：14〕<sup>41</sup>。河西、东北都出现了墓主人手持麈尾的图像，前者为侧坐，后者为正坐。但从后来历史演变的结果看，前者没有发展下去，后者则成为一种新图式。目前还不能判断八角村墓与上王家村西晋墓哪个年代更早一点，但很显然二者的文化联系要比八角村墓同河西壁画墓的关系紧密得多，二墓共同具有的墓主人持麈尾正坐的形象，代表着墓主人形象新图式的出现，其产生地区是在西晋时期的幽、平二州（汉魏时同属幽州）境内。

十六国时期，这种墓主人形象在东北地区获得继续发展。357年的朝鲜安岳三号墓相当于十六国前期，前室西侧室西壁所绘男墓主人像就是新图式〔图十三：18〕，前室西侧室南壁还绘有女墓主人侧坐像〔图十三：19〕<sup>42</sup>，与西壁男主人形成斜对坐关系，仍保留着东汉时期东北地区壁画的构图特点；另外，女墓主人左侧的单人侍女〔图十三：20〕与八角村墓墓主人身旁侍女的发型最为接近〔图十三：16〕。发展到十六国后期，男墓主人依然是新图式的形象，同时开始出现墓主人夫妇并坐图，两人皆端坐，大小相当，不似东汉中原地区男、女墓主人像之间有主次之别，如辽宁朝阳北庙村1号北燕墓<sup>43</sup>北壁壁画〔图十三：21〕、409年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后室北壁壁画（女墓主人处空位以待）〔图十三：23〕<sup>44</sup>。二墓还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北庙村1号墓继承了八角村墓以来的牛耕图〔图十三：22〕；德兴里壁画墓开启了墓主人夫妇并坐与男女侍从、牛车鞍马共同组合的新构图。这一新构图形式成为北魏平城地区墓葬壁画的鲜明特点，如太延元年（435）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东壁壁画〔图十三：24〕<sup>45</sup>、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墓椁内四壁壁画〔图十三：25—28〕<sup>46</sup>。

可见，像八角村墓那样的墓主人形象是改进东汉旧样后、创新于幽州地区的一种新图式，而且形成一定的文化圈，十六国时期都是在东北地区持续发展，见于三燕墓葬和受其影响的高句丽墓葬，直到北魏灭北燕后才流入平城。从文化源流的梳理中，我们对八角村墓石龕的来源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关注的目标聚焦到西晋时期的幽州鲜卑上。不过，西晋晚期至十六国初期，活跃于幽州舞台上、与蓟城（今北京）首脑过从甚密的还不是慕容鲜卑，而是其西邻、东部鲜卑的另一支——段部。段部鲜卑败亡后，其残部或投降、或被俘、或被杀而并入慕容鲜卑。东晋咸康四年（拓跋建国元年）（338），石虎征段部大单于段护辽于辽西，护辽奔平冈山，遂投慕容皝，皝杀之。护辽弟郁兰

〈1〉 李庆发：《辽阳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7期。

〈2〉 平山郁夫总监修：《高句丽壁画古坟》页76—77，东京：共同通信社，2005年。

〈3〉 朝阳地区博物馆、朝阳县文化馆：《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陈大为：《朝阳县沟门子晋壁画墓》，《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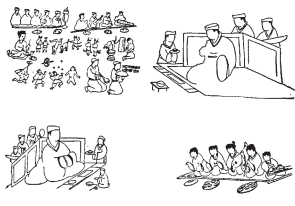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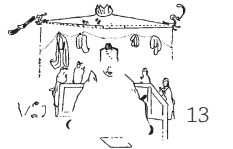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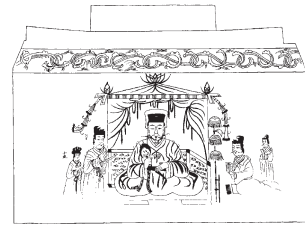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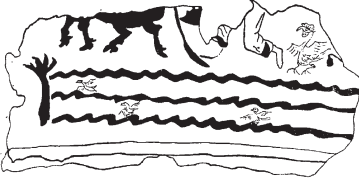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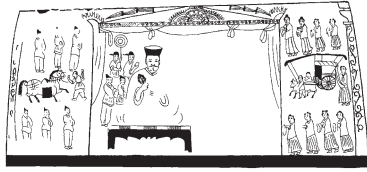



〈4〉 前揭《高句丽壁画古坟》页131。

〈5〉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

〈6〉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第7期。



〔图十三〕东汉至北魏墓主人静坐像的演变

墓主人静坐像	
东汉 中原地区	     <p>1                      2                      3                      4                      5</p>
东汉 东北地区	    <p>6                      7                      8                      9</p>
魏晋 时期	    <p>10                      11                      12                      13</p>     <p>14                      15                      16                      17</p>
十六国 前期 东北地 区	   <p>18                      19                      20</p>
十六国 后期 东北地 区	   <p>21                      22                      23</p>
北魏 平城 地区	     <p>24                      25                      26                      27                      28</p>





奔石虎，以所徙鲜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段郁兰死，子龁代之；及冉闵之乱(350—352)，段龁率众南移，遂据齐地；慕容俊使弟玄恭帅众伐龁于广固，执龁送之蓟，俊毒其目而杀之，坑其徒三千余人<sup>1</sup>。与此同时，段末柸之子勤鸠集胡羯得万余人，自称赵王，附于慕容俊；俄为冉闵所败，徙于绎幕，僭即尊号；俊遣慕容恪击之，段勤惧而降<sup>2</sup>。因此，段部文化实际上成为三燕文化的一部分。

### 三 墓主身份蠡测

八角村墓石龁底板长135、宽70厘米，长度远小于成人的身高，显然不是葬具，而应是供奉墓主人的设施。在西晋晚期至十六国初期的幽州地区，身份不低且能获得段部鲜卑石龁供奉的人物是屈指可数的。

本文整理了一下当时活动于幽州境内，尤其在蓟城附近出没的重要人物的结局情况[表一]。从死亡地点来说，可分为三类：一是襄国(今河北邢台)，这是石勒的都城，王浚、段匹磾、段文鸯等被俘至此，后被杀。二是令支(今河北迁安)，这是段部鲜卑的都城。关于首任单于段务勿尘去世之年，史籍未直接记载，依《资治通鉴》311年已有“辽西公段疾陆眷”的记载<sup>3</sup>，显示当时其世子已袭爵，可知段务勿尘去世之年当在310年或311年。他正常死亡，必葬于令支附近，后来的段涉复辰、段疾陆眷、段末柸几位段部单于也都是死于此。三是蓟城，仅有流亡到此的并州刺史刘琨一人。王浚、段匹磾、段文鸯被杀时，蓟城还不在于石勒之手，把他们的尸首送回蓟城隆重下葬几不可能。段部四单于死在本国都城，正好安葬于祖茔，断不会远就蓟城。这样，刘琨作为八角村墓墓主人的可能性进一步凸显出来。

[表一] 西晋晚期至十六国初期幽州重要人物的结局

姓名	官职	死葬情况	资料出处
王浚	幽州刺史	建兴二年(314)三月，勒至襄国，斩浚，而浚竟不为之屈，大骂而死，首级献捷于汉。	《晋书》卷五《孝愍帝纪》、卷三九《王浚传》
刘琨	并州刺史	太兴元年(318)五月，段匹磾遂缢之，时年四十八，子侄四人俱被害。匹磾既害琨，横加诬谤，言琨欲窥神器，谋图不轨。朝廷以匹磾尚强，当为国讨石勒，不举琨哀。	《晋书》卷六《元帝纪》、卷六二《刘琨传》
段务勿尘	辽西公、大单于	史书未有记载。	《晋书》卷六三《段匹磾传》

1. 《魏书》卷一〇三《徒何段就六眷传》，页2306，中华书局，1974年。

2. 《晋书》卷六三《段匹磾传》，页1712，中华书局，1974年。

3.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纪九》，页2772，中华书局，1956年。



[续表一]

段涉复辰	段务勿尘弟，单于、广宁公	建武二年(318)正月，末杯遂害涉复辰及其子弟党与二百余人。	《晋书》卷六《元帝纪》、卷六三《段匹碑传》，《资治通鉴》卷九〇《晋纪十二》
段疾陆眷	段务勿尘世子，段匹碑兄，辽西公	建武二年(318)正月，病死。	《晋书》卷六《元帝纪》、卷六三《段匹碑传》，《资治通鉴》卷九〇《晋纪十二》
段匹碑	段务勿尘子，幽州刺史	太兴四年(321)四月，匹碑到襄国，又不为勒礼，常着朝服，持晋节。经年，国中谋推匹碑为主，事露，被害。	《晋书》卷六《元帝纪》、卷六三《段匹碑传》
段文鸯	段匹碑弟	被俘到襄国后，遇鸩而死，	《晋书》卷六三《段匹碑传》
段末杯 (末杯、末波)	段匹碑从弟，单于、幽州刺史	末波自称幽州刺史，屯辽西。太宁三年(325)三月，幽州刺史段末波卒，以弟牙嗣。	《晋书》卷六《明帝纪》、卷六三《段匹碑传》，《魏书》卷一〇三《徒何段就六眷传》

太兴元年(318)五月，段匹碑杀刘琨后，琨从事中郎卢谡、崔悦等帅琨余众奔辽西，奉此前滞留于此的刘琨世子刘群，共依段末杯，将佐多奔石勒；于是夷、晋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碑，末杯遣其弟攻匹碑<sup>1</sup>。太兴二年(319)四月，陷入了孤立状态的段匹碑被迫率领部众退出幽州，南奔厌次(今山东惠民东)，投靠乐陵太守邵续<sup>2</sup>。蓟城遂为末杯弟所占领。太兴三年(320)正月<sup>3</sup>，段匹碑令弟文鸯北讨末杯弟于蓟城<sup>4</sup>。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刘群等人在辽西日益受到重用。咸康二年(335)，晋成帝诏征刘群等，因为末杯兄弟爱其才，托以道险不遣<sup>5</sup>。待到段护辽时期，刘群、卢谡任其左右长史，崔悦为其司马<sup>6</sup>。可以想见，在太兴三年左右段末杯势力占据蓟城时，刘群等会寻觅被段匹碑草率、低调处理的刘琨尸骨。也正是在太兴三年，卢谡、崔悦等通过末杯的使者<sup>7</sup>，上表晋元帝为刘琨讼冤，“仰希圣朝曲赐哀察”，帝乃下诏曰：“故太尉、广武侯刘琨忠亮开济，乃诚王家，不幸遭难，志节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吊祭。其下幽州，便依旧吊祭。”<sup>8</sup>段末杯赶走段匹碑，自称幽州刺史，遣使通江左后也就得到东晋朝廷的认可。皇帝诏令幽州吊祭刘琨，承办者就是段末杯，刘琨的儿子、故旧必参与其中。这次吊祭的核心内容应是依刘琨的身份重新改葬。八角村墓地近蓟城，可能就是刘琨再葬之处，墓葬形制采用了幽州地区与刺史级高官相配的前后

<sup>1</sup> 《资治通鉴》卷九〇《晋纪十二》，页2859，中华书局，1956年。

<sup>2</sup> 《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十三》，页2869，中华书局，1956年。

<sup>3</sup> 《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十三》，页2875—2876，中华书局，1956年。

<sup>4</sup> 《晋书》卷六三《段匹碑传》，页1711，中华书局，1974年。

<sup>5</sup> 《晋书》卷六二《刘琨传》，页1691，中华书局，1974年。

<sup>6</sup> 《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页2767，中华书局，1974年。

<sup>7</sup> 《晋书》卷四四《卢谡传》，页1259，中华书局，1974年。

<sup>8</sup> 《晋书》卷六二《刘琨传》，页1687—1690，中华书局，1974年。





双室墓；墓中石龕当为段末杯所供奉的祭龕，既表达对刘琨的敬重，也是对刘群等人的恩惠与笼络；石龕壁画是东汉传统因素(男墓主人正坐)、西晋风俗(男墓主手执麈尾、牛车出行)与鲜卑社会状况(段部鲜卑定居辽西，已事牛耕农业)的结合体，体现了段部鲜卑的吸收与创新。

蠡测八角村墓墓主人为刘琨，还需要解释两个问题。

一是原葬地在哪里？明朝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卷五“刘琨墓”条载：“刘琨字越石，幽州刺史段匹碑推为盟主，共讨石勒，屯蓟城。后为匹碑所害，葬东安县东二十里。”<sup>1)</sup>明朝东安县，即西晋安次县，位于今河北廊坊市南部。段匹碑南奔厌次后，蓟城为段末杯短期占据，周边地区时时遭到石勒和段匹碑的攻击。初葬于安次的刘琨墓，离蓟城较远，改葬时迁到蓟城西郊，估计有安全方面的考虑。而且八角村墓还有进一步的防护措施，其建造地点位于当时永定河故道之一的金沟河<sup>2)</sup>的河道砂石之下，地表不仅不封不树，还可被河流淹没，显然是为求安全的“潜埋”之举。

二是墓中现存尸骨是谁？史书明载，刘琨死时年仅48岁，而八角村墓内男性尸骨年龄在60岁以上<sup>3)</sup>，与刘琨不符。为此，我们再次审视墓内遗迹的情况，发现墓葬被盗严重，棺木只存遗痕，而男性尸骨保存近乎完好，是令人感到反常的现象。从洛阳魏晋墓葬的情况看，被盗砖室墓中尸骨保存情况都很差，残朽甚多或无存。而且，该尸骨远离后室，斜躺在前室石龕前，也不似漂移所致，而应是死者生前如此。因此，笔者怀疑该男性尸骨为较晚时期进入墓葬的盗墓者，由于某种原因毙命墓中，死前曾倚坐于石龕前。而刘琨本人的尸骨历经迁葬、盗毁和漫漫时日，已然化为灰泥。

本文以石景山八角村墓墓主为西晋抗胡名将、“闻鸡起舞”主角之一的刘琨，聊备一说，供后续研究者参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项坤鹏)

1)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页10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2) 王乃梁、杨景春、徐海鹏、韩慕康、任明达、李凤棠、郑公望：《北京西山山前平原永定河古河道迁移、变形及其和全新世构造运动的关系》，《第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会议论文集》页179—183，科学出版社，1982年。

3) 潘其风：《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壁画墓出土人骨的观察研究》，《文物》2001年第4期。

